

景区依托型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研究

——以黄果树镇石头寨村为例

徐倩^{1, 2} 李阳兵¹ 黄娟¹¹

(1. 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2. 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以毗邻黄果树瀑布风景区旅游村落石头寨村为典型案例, 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 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 分析了 34 年来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 (1) 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 3 个阶段; 土地利用实现了从村落中心区到外围区, 从平面到立体的空间拓展过程; 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沿河、沿路扩张模式; (2) “旅游化过程”促使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转变, 乡村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比例降低, 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比例上升, 乡村聚落功能由单一的居住生活功能向居住—休闲旅游复合功能转变; (3) 自然地理条件是乡村聚落空间扩展的基础, 旅游资源开发是乡村用地扩展的支撑动力, 黄果树瀑布景区旅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乡村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 政府调控是乡村用地变化的引导动力,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共同驱动景区依托乡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当前石头寨村进入以特色旅游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升级阶段。对其乡村旅游发展而言, 原有用地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 要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必须针对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特点和要求, 充分考虑现有乡村聚落旅游用地需求, 加强乡村用地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 并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 景区依托型 乡村聚落 用地格局 功能 石头寨村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 (2020) 07-1545-10

乡村聚落是指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人类聚居场所, 是农户生产生活的栖息地、农村人地关系表现的核心^[1], 目前仍是中国人口的主要聚居形式^[2]。当前中国仍有 5.9 亿农村常住人口居住在 200 多万个村庄中^[3]。乡村聚落格局体现了一个地域的特点, 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交叉影响的综合反映。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4]。旅游活动影响的聚居空间的演变过程是深入理解旅游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机理与社会调控的关键所在。景区依托型乡村聚落是指在著名风景区边缘, 并以景区为核心, 依托乡村特有旅游资源和景区稳定客源而发展起来的旅游乡村聚落, 是典型旅游型乡村聚落。这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既具有乡村旅游地的一般特征, 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往往集地域空间依附性、旅游资源互补性、客源市场共享性、区域经济相对滞后性和利益主体复杂性等诸多特征于一体, 成为协调区域统筹发展的重点扶持区域和核心景区旅游转型、扩容提质的重要地域依托^[5]。当前关于旅游乡村聚落的研究多集中于景观变化^[6]、空间布局、形态演变^[6~9]、旅游村落产业变化特征^[10]、人居环境演化及机制研究等方面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方面研究^[11~14]。

作者简介: 徐倩 (1986-), 女, 讲师,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岩溶资源管理与区域发展. E-mail: 84428004@qq.com; 李阳兵, E-mail: Li-yangbing@sohu.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261045);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2020QN007); 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 [黔科合 LH 字 (2016) 7202 号]。

而对景区依托型旅游村落问题的研究,则较为少见。当前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分布于城市与景区周边的旅游村落成为中国乡村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人地关系危机,日益成为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以贵州省为中心的西南岩溶山地分布有较多的风景名胜区,这些旅游区对其周边乡村人地关系的影响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周边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的演变?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做出深入、客观的评价。故此,本文试图以黄果树瀑布风景旅游区附近的石头寨村为例,综合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参与式调查,以多时相聚落用地类型与功能识别为基础,测度村域尺度的聚落用地格局及功能结构的连续变化特征,深入分析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规律。研究结果对于当前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及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黄果树旅游区,现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景区周边分布着大量的布依族村寨,优质的核心景区旅游资源和互补性极强的乡村旅游资源为该区域的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黄果树景区旅游圈的构建,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地的发展,但也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地空间秩序的有序发展。因此,探讨景区依托型乡村聚落演变规律和形成机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石头寨村(106° 25′ E, 26° 15′ N)位于贵州省黄果树旅游区附近,地处黄果树瀑布上游 6km 处,距安顺城区 30km,距省会贵阳 122km。该村面积为 648hm²,截至到 2017 年年底,全村共有 3216 人。石头寨村以“石屋”和“蜡染”出名,享有“石头王国”和“蜡染之乡”的美誉,石头寨 1986 年被省文化厅批准为布依蜡染之乡,2015 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是国家、省级特色少数民族村寨。石头寨村是典型的旅游景区依托型村落,自 1982 年石头寨村开发建设以来,受旅游业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村民的收入增加,大量的农户参与到景区旅游服务和相关产业中,逐渐对旅游产业的依赖度升高,使得村民从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向旅游服务模式转变,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因此石头寨村聚落格局与功能的演变在景区依托型旅游村落中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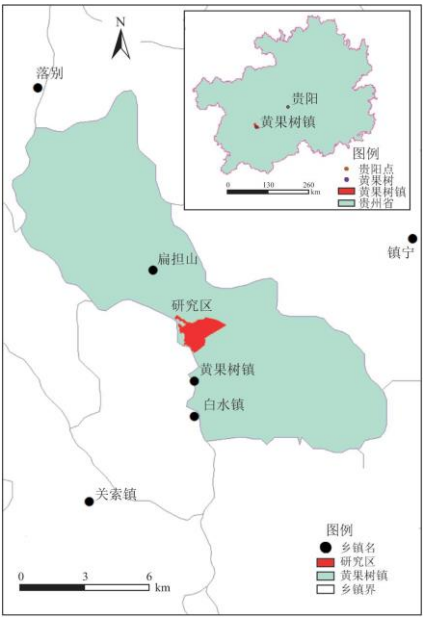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区位图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如研究区用地变化及其原因主要来源于参与式农村评估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简称 PRA)、农户调查; (2) 第二手资料来源于研究区 1984、1997、2005、2013、2018 年 Googleearth 影像数据 (其中 1984 和 1997 年的空间分辨率为 8.5m, 剩余三个研究时段的空间分辨率为 0.5m)。参考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分类的相关研究, 获取研究区五个时段的乡村聚落用地类型分布数据。

具体应用上, 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 (PRA) 校正不同年份研究区的聚落用地类型。步骤如下: (1) 乡村土地利用现状资料收集标注。收集资料、确定研究方案后, 参照 2018 年 0.5m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图, 对主要的居民点和道路等地貌和地物进行图上标注。(2) 逐个农户访问。在石头寨村村长带领下, 于 2017 年 7 月~2018 年 3 月, 先后 3 次对当地居民进行逐户调查访谈。访问内容包括: 住房建造时间, 住房功能变化时间; 农户人口和劳动力组成, 人口素质; 家庭收入支出情况, 农业及旅游业收入以及在收入中占的比例; 各类土地利用数量; 从事旅游服务的时间等。在访谈过程中, 与他们一起在遥感影像图上讨论土地利用类型与分布, 并进行实地勘察。(3) 访谈后信息订正。将调查的信息编绘在地形图和现有土地利用图上, 并进行实地测量, 绘制土地利用的历史图件 (1984、1997、2005、2013 和 2018 年)。(4) 数据检验。对从调查地点得到的信息参照相关材料进行分析, 得到了初步认识, 并把认识返回到受访对象, 请他们评述, 最后确定研究所用的数据。

1.3 研究方法

主要通过刻画不同时相聚落用地规模、空间分布及其类型结构变化, 揭示乡村聚落用地空间与功能变化特征。

1.3.1 乡村聚落用地类型划分方法

目前针对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存在分类体系不够完善, 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15]。因此, 本研究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和《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在大量实际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的特点, 建立如下分类体系 (表 1)。

表 1 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类型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三级地类	说明
商服用地		旅游购物用地	包括小型商店、超市、蜡染铺
	住宿餐饮用地	旅游住宿用地	包括农家旅馆、客栈
		旅游餐饮用地	包括农家乐、小吃店等
	其他商服用地	旅游服务用地	包括停车场、旅游服务中心、博物馆等
住宅用地		普通住宅用地	
公共服务用地			科教用地、公共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街巷用地、农村道路

水域			河流水面、内陆滩涂
其他用地			空闲地、裸地
耕地			
林地			
园地			

1.3.2 乡村聚落形态空间格局的表征指标

(1) 聚落用地扩张和类型变化

分析不同时段乡村聚落空间规模扩张演变的强弱和快慢, 可通过乡村聚落空间扩展情况来反映。乡村聚落的空间扩展, 包括横向的平面扩张和纵向的建筑空间增长^[16]。

横向平面扩张: 以扩张强度指数表征聚落用地空间的平面扩展^[17], 刻画研究单元内聚落用地变化程度, 指数值越高, 扩张越快, 反之, 则越慢; 当指数为负值时, 表示聚落用地由扩张转为减少。计算公式如下:

$$K_i = \{ [(U_i^n - U_i^m) / T_{(n-m)}] / S_i \} \times 100\%$$

式中: K_i 为空间单元 i 的年均扩张强度指数; U_i^n 和 U_i^m 分别为空间单元 i 两时点的聚落用地面积; $T_{(n-m)}$ 为两时点间的时长; S_i 为研究单元面积。

纵向建筑空间增长: 以土地利用强度来表征研究区的纵向建筑空间增长的变化情况^[17]。容积率 (F) 表示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容积率愈大, 表示研究区建设开发强度愈高, 土地利用率也愈高; 反之, 则土地利用率也愈低^[18]。计算公式如下:

$$F = R/H$$

式中: R 为总建筑面积; H 为用地面积。

(2) 聚落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表征指标

数量特征: 聚落土地利用转移矩阵。采用 ArcGIS 的空间处理功能, 建立不同时段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空间特征: 用重要度指数定量描述聚落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重要程度^[16], 是判定聚落功能变化的重要表征。计算公式如下:

$$B = \frac{D_i}{\sum_{i=1}^n D_i} \times 100\%$$

式中:B 为重要度指数; D_i 指 i 类聚落用地变化量;n 为聚落用地变化类型。

2 结果分析

2.1 乡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

2.1.1 乡村聚落平面扩展

1984~2018 年,研究区聚落面积从 39858.41m²增加到 390069.62m²,增长了 350211.21m²,年均增加 10300.33m²,总体年均扩张强度指数 0.56,年际变化较大。原来沿伍家坡上分布较为集中的聚落用地向周边不断扩展。其中,2005 年以前,聚落用地增长相对缓慢,年均扩张强度指数低于 0.15;2005~2013 年扩展数量最多、强度最大,扩展面积为 207707.91m²,扩展强度指数达 1.41,扩展贡献率达 59.31%。2013~2018 年次之,扩展面积 119110m²,扩展强度指数为 1.29,扩展贡献率为 34.01%。平面扩展的过程基本集中在后两个阶段(图 2、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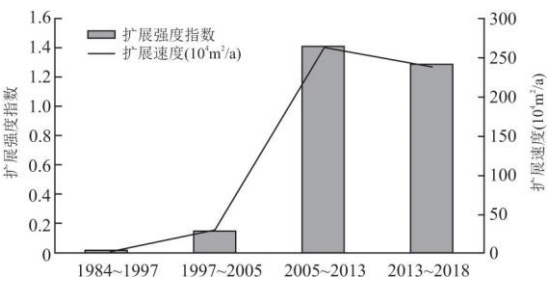


图 2 1984~2018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扩展速度和强度

表 2 1984~2018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扩展变化

时期	扩展面积(m ²)	扩展贡献率(%)
1984~1997	1171.32	0.33
1997~2005	22231.93	6.35
2005~2013	207707.91	59.31
2013~2018	119110	34.01
1984~2018	350211.21	100

2.1.2 乡村聚落空间扩展方向

1984~2018 年,在空间上,聚落用地扩展模式以“核心—边缘”扩展为主,聚落用地扩张具有较强的集中性,沿村内伍家坡周围和公路一侧及河流两侧沿线的乡村聚落用地扩张迅速,聚落用地带状、团状扩张模式明显。分时段来看,1984~1997、1997~2005 年两个时段,聚落用地扩展比较缓慢,2005~2013 年,聚落用地扩展集中在石头寨村西北部及中部主体区。2013 年以后,聚落用地继续在原有土地上扩展,表现为填充式扩展(图 4)。

2.2 乡村聚落建设土地利用强度变化

2.2.1 土地利用强度

1984~2018年,石头寨村建筑面积从37759.46m²增加到221223.74m²,增长了5.86倍,年均增5396.01m²。容积率相应地从0.03增长到0.21(图3)。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05~2013年是建筑面积增加数量最多的时期,增加面积75262.26m²,增加贡献率达41.02%,增速达9407.78m²/a(表3)。其次是2013~2018年,增加面积57560.9m²,增加贡献率为31.37%,两者加在一起达到了总增加面积的72.39%,即在此两个时段内,基本框定了石头寨村立体扩展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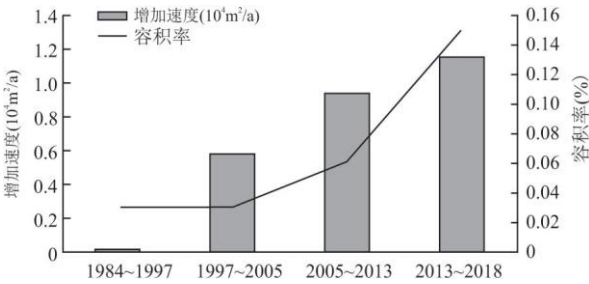


图3 1984~2018年石头寨村建筑面积增加速度和容积率

表3 1984~2018年石头寨村建筑面积的变化

时期	增加面积 (m ²)	增加贡献率 (%)
1984~1997	4122.33	2.25
1997~2005	46518.79	25.36
2005~2013	75262.26	41.02
2013~2018	57560.9	31.37
1984~2018	183464.3	100

2.2.2 土地利用强度空间格局变化

1984~1997年,一层、二层建筑集中分布在伍家坡东侧一带;1997~2005年,二层建筑开始向白马河沿岸和村内主体两侧分布,呈团状分布;2005年以后,村落周边,特别是西北-东南扩张轴的两端三层以上建筑显著增加,沿白马河和村内主路分布的格局加强(图4)。总体上说,石头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3个阶段。

2.3 乡村聚落用地功能变化

2.3.1 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空间格局分布

1984~2005年石头寨村聚落功能及景观格局变化不大;2005年后,乡村聚落用地规模扩张的同时,用地功能日益丰富,功能内

涵及景观格局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为主逐步向满足旅游者多方面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功能转变,其功能变化见(图 5)。

1984~1997 年,普通住宅用地集中分布在村庄中部。1997~2005 年,普通住宅开始从集中分布区向西南部扩展,呈现远离主路、沿白马河一侧集中分布的格局。2005~2013 年,旅游餐饮、住宿用地开始向村庄中部、白马河沿岸集中分布。2013~2018 年,旅游餐饮、购物和旅游服务用地继续向村庄西北、东北两端扩展(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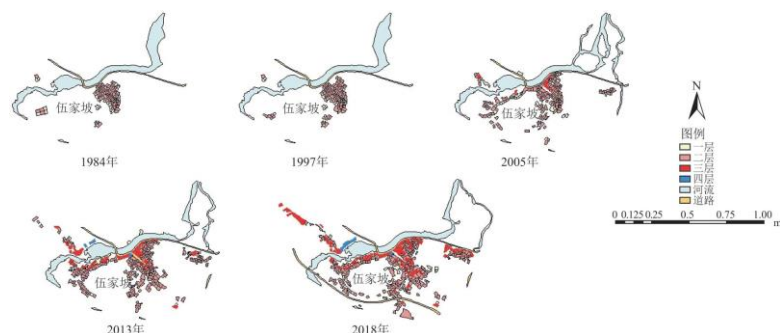


图 4 1984~2018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时空扩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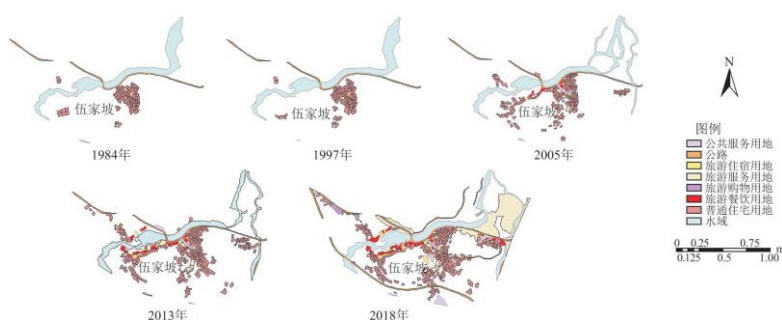


图 5 1984~2018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功能变化

2.3.2 乡村聚落用地功能主要变化方向

1984~1997 年,石头寨村主要表现为以单一传统民居功能为主,普通住宅用地的重要度指数(B)为 44.64%,转换面积为 3305.2m²;主要由其他用地和耕地转化而来,转化面积分别为 2231.543 和 1073.66m²。

1997~2005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功能虽仍以居住功能为主,但在该时期内,逐步出现了其他服务功能,其中普通住宅用地的重要度指数(B)为 57.27%,主要由其他用地和耕地转换而来,转换面积为 9088.236 和 5315.93m²;其次为公共服务用地和旅游餐饮用地,重要度指数(B)为 19.67%和 9.87%,转换面积为 9876.148 和 2194.733m²。

2005~2013 年,这段时期的变化与前两个阶段相同,普通住宅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及旅游餐饮用地仍是转变的主要类型,重要度指数(B)分别为 48.47%和 26.73%和 10.58%。转移面积为 28258.58、10986.78 和 4958.69m²;此外,传统民居功能逐渐“内化”向其他旅游用地功能转变的趋势加强,其中普通住宅用地转变为旅游餐饮用地面积为 1207.62m²。

2013~2018 年,旅游服务用地面积急剧上升,重要度指数(B)高达 89.49%,主要由耕地和其他用地转换而来,转换面积为

96959.72 和 13496.01m²;与上一阶段相同,普通住宅用地内部转换为旅游餐饮用地、旅游住宿用地、旅游购物用地的面积呈上升趋势,面积分别为 2085.276、1244.53 和 1509.86m²(图 6、表 4)。

总之,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功能自 1984~2018 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乡村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比例降低,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比例上升,乡村聚落功能由单一的居住生活功能向居住—休闲旅游复合功能转变。

表 4 1984~2018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变化类型的重要度(%)

重要度指数(B)	1984~1997	1997~2005	2005~2013	2013~2018
公共服务用地	34.69	19.67	26.73	-2.46
普通住宅用地	44.64	57.27	48.47	5.18
旅游住宿用地	20.67	1.33	4.55	2.00
旅游餐饮用地	0	9.87	10.58	3.73
旅游购物用地	0	0	0	2.07
旅游服务用地	0	11.86	9.67	8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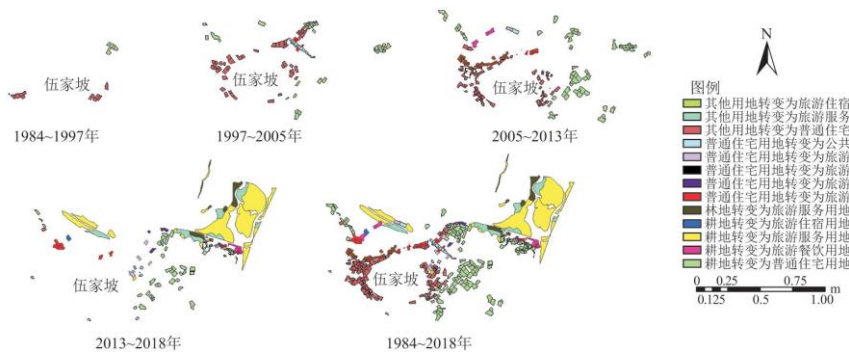


图 6 1984~2018 年石头寨村聚落用地功能转化

2.4 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的驱动机制

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的演化主要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19]。自然条件对乡村聚落格局变化起着长期稳定的基础性作用;就旅游地依托型村落来说,尤其是短时间尺度内,社会经济政策等条件的变化对其空间演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发现,石头寨乡村聚落空间扩展的演变隐含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农户、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等内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旅游市场需求变化拉动下,政府调控渐进式介入和农户行为等要素在个体和群体间相互影响。

2.4.1 环境支撑是乡村聚落空间拓展的基础动力

自然条件是乡村聚落空间形成的物质基础和背景因素,从总体上影响其布局形态、规模、密度和扩展态势及各种功能用地的

布局。从整体特征看,早期石头寨村落的选择具有黔中丘原盆地村落区位选择的典型特点,遵循布依族“占山不占田”的原则^[20],村寨主体坐落在岩丘(伍家坡)的坡脚,寨子周围的洼地、盆地则成为田坝。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靠近公路和临近白马河沿线,由于区位条件优越,成为主要扩展区和旅游接待服务设施的主要布局点。

2.4.2 旅游资源开发是乡村聚落扩展的支撑动力

乡村文化旅游特别是古村落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就在我国迅速兴起,石头寨村具有600多年的历史,房屋都是由当地的石头堆砌而成。村民家中用的桌、凳、盆、磨、灶以及院落的墙垣、家中的通道、村前的小桥、梯田的堡坎也都是由石头修筑。建筑依山就势而建,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形成了独特的布依民居风貌。作为拥有较独特的古建筑和完整民族文化传统的石头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吸引了一大批专业人士和一些散客。特别是1985~1990年左右,到石头寨旅游观光的国内外游客较多,国外游客年约2000人次,国内游客则达万余人次,这一时期是石头寨乡村旅游的起步阶段。此时,石头寨村民尚未产生商品经济意识,在向旅游者展示其独特文化的同时供其免费参观,并为其吃、住、行等活动提供无偿帮助与服务,而旅游者则以赠送糖烟酒等礼物的形式作为回报。故此时石头寨村的乡村聚落格局并未发生明显变化。2003年末以来,黄果树管委会为了建设“大黄果树旅游圈”,黄果树旅游集团公司开始对石头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2004年5月1日正式对游客进行开放,旅游公司的进入加快了石头寨乡村旅游的发展,石头寨的环境面貌得到初步改善。到2005年底,全村有30余户村民在旅游公司的帮助下开办乡村家庭旅馆和餐饮服务,但设施比较简陋。在旅游公司的引导下,游客人数逐渐增多。之后至2018年,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石头寨村村民因经营家庭旅馆、餐馆、蜡染铺等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又刺激了农民建房的冲动,经历了几十年的原始积累,农民具备更新住宅的意愿和能力。另外,原有住宅环境较差、面积偏小等缺陷,既难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也达不到农户的家庭需求,由此促使农户建房向舒适化方向转变。

2.4.3 黄果树瀑布景区旅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乡村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

从石头寨村旅游综合体构成看,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毗邻黄果树瀑布景区6km)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享有“石头王国”和“蜡染之乡”的美誉)成为大多数游客除黄果树景区外的选择。根据当地旅游区统计,2005~2017年,黄果树景区旅游接待人次从52万增长到224万,增长了4倍,平均每5年翻一番,并每年仍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旅游区接待人次规模化快速增长对石头寨村的旅游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当地旅游市场需求拉动下,村民会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通过不断扩大接待能力、服务能力的方式在村内向旅游市场进行供给,以期获得最大经济收益。显然这种规模化的中低档市场需求使得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低档次服务、接待设施建设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

2.4.4 政府规划调控是乡村聚落用地逐渐趋稳的引导动力

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旅游商业化^[21]。政府调控主要通过影响乡村发展的土地分配、农业发展、户籍管理等各种制度、政策和管理体制,尤其是针对性极强的宅基地管理、村镇规划和户口迁移等政策法规来实现。在石头村乡村格局演变中,政府调控基本遵循以下路径:(1)初期起步阶段。此阶段缺乏相应的组织协调管理。石头寨的旅游发展处于一种自发式的松散型的状态,无专门的组织机构协调旅游发展,村支两委充当临时的管理协调机构,当地农户并为对现有住宅的功能进行转化。(2)中前期大力推动。2004年,批准成立石头寨旅游开发公司,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发展旅游具有巨大潜力和带来现实收益,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扶持的力度,对村庄建房宅基地审批实行宽松政策,以解决接待服务设施高度短缺的问题;(3)中后期监管逐步严格。2008年后,随着石头寨村平面扩展对耕地侵占的日趋严重,土地监管政策由松懈逐步转为紧缩,建设用地审批困难,并对乱建行为进行规范,村庄向立体拓展,农户大多选择旧有宅基地翻新改建,由原来的1~2层干栏式房屋改建为2~3层小楼房,基本框定村庄发展架构,并持续至今。由此可见,在石头寨村土地利用演变中,政府角色由“自发型”向“积极参与型”、“规范立法型”与“严格管理型”不断转变。

3 讨论

乡村聚落格局的变化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19]。景区依托型乡村聚落由于受社会经济环境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与自然村落相比,具有更为明显的演变特征。这种演变特征势必为区域带来各种效应。石头寨村作为依托于黄果树瀑布风景区的旅游村落,其34年以来乡村聚落演进的规律表明:旅游村落作为当前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的主要形式^[21],但在其演进过程中,由于我国乡村旅游长期以来基本在自发组织状态下发展,导致旅游型乡村聚落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为:

(1)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乡村空间无序扩展。旅游相关的建设用地扩张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同时,旅游活动增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会加剧区域内的人地矛盾。

(2)传统乡村的文化景观消失,“半城镇化”现象严重。文化景观是发展乡村旅游市场的独特卖点或核心资源,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20]。在石头寨村过去34年发展中,不注重传统街区、传统风貌的保护和继承,使村落原有布依族特色石头民居风貌遭到破坏,地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正在丧失它的形态、地标、识别性、特征,住房形式单一问题比较突出。对于旅游型村落而言,在新型特色旅游文化尚未建立的前提下,特色景观的丧失直接威胁其发展的根本。

(3)乡村聚落功能未能满足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的、小型的、自发式的旅游产品供给模式难以实现乡村旅游功能完善和服务质量提升,引发乡村基础设施匮乏、公共服务滞后等问题。

当前,我国的旅游型村落的转型如果仍然延续既有的“小农式”发展演进模式^[21],将难以满足旅游市场“品质化、多元化”的需要。在现有发展基础上,按照旅游市场需求,针对旅游型村落用地特点和要求,加强规划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推进有序化、可持续性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已成为新型特色乡村(城镇)规划建设、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关键。因此,在未来乡村旅游发展中,要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挖掘乡村文化传统,实现乡村景观重塑和文化重建;要适度开放土地政策,满足旅游功能“模块化、多元化”发展要求。

旅游村落用地问题关系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22]。本文以转型期旅游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化的问题为导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景区依托型旅游乡村聚落进行调查,深入探讨该类型乡村地域系统演进时空特征,系统梳理其演变规律及驱动机理,为推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做出具有地理学科特点、富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性成果。但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聚落演变特征的本质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因此,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采用更为系统的定量分析方法挖掘出不同模式的乡村旅游聚落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与差异规律。

4 结论

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参与性农村评估PRA相结合的方法支持下,从聚落空间形态和功能类型方面,分析了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格局及功能的时空演变特征,结论如下:

(1)1984~2018年,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逐年扩张,其中,1984~1997、1997~2005年两个时段,增速较慢;2005~2013年,石头寨村乡村聚落快速扩张;2013~2018年,仍保持快速增长,但和上一个研究时段相比,增速回落。总体上说,石头寨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三个阶段。经历了从核心区到外围区,从平面到立体的空间拓展过程;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沿河、沿路扩张模式。

(2)“旅游化过程”促使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转变,乡村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比例大幅降低,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比例快速上升,以居住用地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旅游—商服主导的多元化复合型用地模式,支撑了乡村聚落由单一的居住生活功能向居住—休闲旅游复合功能转变。

(3)自然地理条件是乡村聚落空间扩展的基础,旅游资源开发是乡村聚落扩展的支撑动力,黄果树瀑布景区旅游市场需求快

速增长是乡村聚落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政府调控是乡村聚落用地变化的引导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景区依托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金其铭.我国农村聚落地理研究历史及其进今趋向[J].地理学报,1988,43(4):311-317.
- [2]周国华,贺艳华,唐承丽.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J].地理学报,2011,66(4):515-524.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4]席建超,王新歌,孔钦钦,等.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J].地理学报,2014,69(4):531-540.
- [5]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等.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J].地理科学,2014,34(11):1353-1360.
- [6]李丽娟.旅游发展背景下元阳遗产核心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演进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6.
- [7]王发艳,李阳兵.红枫湖流域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岩溶,2014,33(3):326-337.
- [8]殷素兰.张谷英村聚落景观形态发展形成机制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 [9]周政旭,王迅迪.山地乡村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研究——以贵州中部白水河谷地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7):97-105.
- [10]高苹,席建超.旅游地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野三坡旅游地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资源科学,2017,39(8):1535-1544.
- [11]杨兴柱,查艳艳,陆林.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过程、驱动机制和社会效应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2016,31(8):40-51.
- [12]杨兴柱,孙井东,陆林.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J].地理学报,2018,73(2):276-294.
- [13]朱鹤,刘家明.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J].地理研究,2018,37(12):2490-2502.
- [14]杨效忠,叶舒娟,冯立新.景区依托型旅游村与核心景区耦合发展研究[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1,23(2):1-8.
- [15]朱晓华,丁晶晶,刘彦随,等.村域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山东禹城牌子村为例[J].地理研究,2010,29(5):883-890.
- [16]史焱文.传统农区工业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以河南省新乡县、长垣县为例[D].河南大学,2016.

-
- [17]ANTROP M.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7 (14) :9-26.
- [18]陈诚, 金志丰.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以无锡市惠山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 34 (11) :2155-2164.
- [19]LEPP A.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village, Ugand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 (3) : 876-885.
- [20]李修竹. 石头寨景区及周边村落概念性发展规划及策划[D].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 [21]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J]. 地理学报, 2011, 66 (12) :1707-1717.
- [22]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过去 25 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4, 33 (19) :1928-1941.